

汉字有话说

说出中华文化原初样式

老湾 著

汉字有话说

说出中华文化原初样式

老蔺葦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字有话说 / 老湾 著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16. 6
ISBN 978-7-5060-9095-7

I. ①汉… II. ①老… III. ①汉字—古文字—研究 IV. ①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9665 号

汉字有话说

(HAN ZI YOU HUA SHUO)

作 者 : 老 湾

责任编辑 : 辛春来 杨 灿

出 版 :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 10000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8.25

字 数 : 298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060-9095-7

定 价 : 58.00 元

发行电话 :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 请拨打电话 : (010) 85924602 85924603

谨将本书题献给 90 后爱女小灰狼。

愿她的同代人连同我们 60 后，乃至更多的汉语言说者，都乐意且能够
从汉字文化的源头上寻找到行走世界的力量。

——老湾

汉字如何“言说”世界

——写在《汉字有话说》出版之前

本书从完稿到出版，历时年余，期间越发觉得若不能就汉字“言说”世界的主要特征向读者做点说明，总有些不妥。所虑自己远非古文字业者，讨论如此重大话题，非能力所及。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或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阅读，也可就此问题求教于方家。

一、汉字的其名自呼及其演变

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好像没有问题，却忽略了字音在汉字中的表义作用。世人多依据埃及象形文字退隐、腓尼基字母文字兴起的西文发展轨迹，在中西文字的比较中将汉字归于象形文字阶段，进而推论拼音化道路代表着汉字的未来。事实已经证明，这是非常错误，甚至有害的观点。现在来看看它有可能错在哪里。

训诂学素有声（音）训传统，在《易经》等先秦典籍中有大量例句。至汉代广泛应用，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刘熙的《释名》是其代

表。北宋王子韶（字圣美）首倡“右文”说，主张汉字形符（左文）表类，声符（右文）表义，进而主张以音求义。至段玉裁注解《说文解字》时，进一步发展出“声义同源”和“音近义通”说，获得巨大成功。为了能把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说清楚，周清泉在《文字考古》中又返回到早期的“其名自呼”说寻找资源。

所谓“其名自呼”，在《山海经》中也称之为：其音如呼、其名自啸、其名自诤、其名自号等等，意思是说精卫、牙豚、交鸟等鸟兽的名字，其字音来源于它们的鸣叫声。这一观点也很好理解，例如家禽雞（鸡）鸭鵝的字音，就源于它们的自呼。

至于汉字字形，说法虽多，但可简化为象形构件和方块结构两大特征，也即通常所说的汉字是象形字和方块字。汉字基本构件（含部首和独体字）初源于象形刻画，已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仓颉造字的早期传说中就蕴含有这一观点。《春秋元命苞》称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洛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说文解字·叙》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hang 音）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将象形说和自呼说合并谈论，大致可以推导出这样的观点：表征万物的字形来源于万物在大自然中的留影和痕迹（象形），字音来源于它们的自呼；再按照指称论（意义即指称）的说法，其字义则是万物自己。万物自己表征自己、自己呼出自己，造字者（人）只是忠实的记录员而已。这样的一组形音义关系，构成了汉字“言说”世界的独特方法，也是华夏先民与世界相遇的独特方式，可简称之为“其名自呼”，伴随有“其形自画”和“其义自显”的意思。

笔者想表达的三点看法是：第一，汉字“言说”世界的这一独特方式，与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精神、《老子》哲学中的“得一、无

为、自然”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等，基本上一脉相承。笔者将此表述为“在的哲学”，意即人和万物同在世界之中，让万物自己“说”出自己，让万物各得自己之“一”，人所要做的只是“抱一”“守一”，即可顺道而为。可参考书中有关文字，这里不展开讨论。第二，形声字可视为“其名自呼”的延续，且与亚里士多德通过“种加最近的属差”获得定义的做法相通。形声字的形符表类，类即种；声符表义，可视为所表征事物的自呼，于自己所在的类中呼出自己的属差来。第三，汉字“其名自呼”传统一直沿用至今，为汉字“言说”未来生活提供了巨大便利。火车、列车，电脑、计算机诸词可证。其中，火车、列车中的车字表征类别，如同形声字中的形符；火字可视为火车蒸汽机车头的自呼，因而同人力、畜力车相区别；列字可视为列车车厢的自呼，进而与单体车厢的车辆相异；两词虽表征同一物，同类（同为车类）而异呼（一呼为火一呼为列）。电脑和计算机两词最初表征的也是同一物（随着个人电脑的进一步普及，未来或有变化），但异类（一为脑类一为机类）异呼（一呼为电子一呼为计算）。相比较火车和列车而言，电脑和计算机两词获得了更大的“言说”便利。

二、汉字与拼音文字原本殊途

饶宗颐考证，把西北半坡系陶符与腓尼基字母比对，形构相同的竟有20个之多。继而慨叹：“中国何以不采用字母，此一问题至今仍令人费解。西方语言学者，千方百计推测中国古代或有字母痕迹。蒲立本对十干十二支的解释，认为是子音。但既然如此，何以殷人只把干支用以

纪日，数万片卜辞中，没有半点语言作用的意味。”^① 饶宗颐提及的蒲立本为加拿大汉学家，认为甲文中的 10 天干和 12 地支为 22 个音符（子音），或与 22 个闪族字母及腓尼基字母有关。

笔者没有能力讨论字母文字来源的话题，仅想依据汉字其名自呼传统，针对饶宗颐所言“令人费解”的问题，展开一点讨论。总的看法是，汉字和拼音文字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中国（汉字）何以不采用字母”是个假问题。我们从下面两个话题切入。

话题 1：拼音文字如何获得字音？

早期的腓尼基字母 22 个，现代拉丁文字母 26 个。其共同点是设定文字的基本音素（子音），同一语族中的所有文字都只能从字母表中挑选出音素，按照一定顺序组合成字形和字音，以表征相应的字义。

接下来我们看看事物如何在拼音文字中“说”出自己的。第一，是万物刻画出自己的字形吗？不是。第二，是万物自呼出来的字音吗？也不是。我们不妨将拼音字母比喻为一架特殊的钢琴，或者称之为“上帝的钢琴”，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琴键。万物要呼出自己，唯一的途径是跳跃到“上帝的钢琴”上来，依次滑过属于它自己的每一个琴键，从而获得字形和字音，得以“言说”出自己。

若细究下去，这架“上帝的钢琴”正是神秘的逻各斯（Logos），也是上帝对世界的设定（太初有言）。世间万物在“上帝的钢琴”上所获得的音符，正是它在 Logos 中所获得的“位格”，万物唯有在上帝的设定中方得以“言说”自身。

^①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第 130 页，饶宗颐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

话题2：汉字为何选择了单音节？

拼音文字优越论者备感困惑的另一个问题是，汉字为何选择了单音节？在他们看来，自然界中很少有单音节的发音，遵循“其名自呼”规则的汉字理当选择多音节。笔者给出的解释是，汉字原本如此。如需进一步解释的话，只能说与汉字处理字音的独特策略有关。该策略可分成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节约与开放。

所谓“节约”，是指每个字只分配一个音节。笔者推测，如果自然界里某物自呼是两个音节的发音，通常是通过快读合成一个音节。反切法注音（取前一字的声母与后一字的韵母合成一音）或是这一做法的文化遗存；少量合文字（如甬）最终也是快读为单音节，可视为这一策略的旁证。倘若不能将两音合成一个音节，可分配两个字给某物自呼，比如用“精卫”二字指称一鸟，以保证一字一个音节的规则不被破坏。如像鸭子自呼音“嘎嘎嘎”，虽是多音节，但只有一个音素，取单个音素组成一个单音节字（鸭）即可。

通过单音节以“节约”字音，其目的是向万物“开放”自呼，汉字因此具备了容纳万物自呼的可能。理论上说，任何一物的自呼均可进入汉字字音。汉字因此获得了应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也就是说，正是为了方便万物“其名自呼”，汉字选择了单音节。

推开古汉字的一扇扇石门

——代自序

本书的目的不是讨论汉语古文字学，而是将古汉字作为特定的考古对象，就像让它们开口“说话”一样地“说”出远古中华文化的原初样式。

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也是人类文明的家园。本书更乐意将语言视为人在生活世界里飞翔的翅膀，不同的民族语言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飞行密码，从中映射出各自族群与世界相遇的方式。古文字则天然沉淀有各自族群最初与世界相遇（含对话和打交道）的历史，以及语言翅膀最初在生活世界里起飞的姿势。在汉文字考古中唤醒上述内容，再延伸至华夏民族独特思维模式、生活习俗及宗教传统等，可大致勾勒出中华文化（及哲学）的原初样式。此即本书所要达成的目标。

文化学乃至哲学意义上的文字考古，因此拥有了等同于发掘华夏民族文化遗址的价值。考古的内容是远古文化乃至远古哲学，考古对象物则是古文字。考古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理清古文字的流变脉络（源远流长的汉字训诂传统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资料），而是将古文字视为一扇扇久远年代的门，门后面所隐藏的华夏先民的生活故事才是本书致力于寻找的文化和哲学宝藏。

从初文、甲骨文走来的汉字，经钟鼎文、篆体、隶书，演变为现代楷书，其流变脉络大致完整。如将不同时代和字体的古汉字比喻为文化沉积岩，则：第一，汉字文化沉积岩的连续性基本完整；第二，中华文化的原初样式可能在上古文字的初义中留有痕迹；第三，以中华文化的原初样式为参照，或许有助于认识到后来的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又或做错了哪些。

读者也不宜将本书当作文字考古的书，尽管本书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或许还会提出进一步商榷的意见；而是要当作文化考古和哲学考古的书来对待。两者之间最为显在的区别体现在各自使用的考古工具上，前者以文字训诂为主要工具，后者以文化再现和哲学演绎为主要工具。方法上，前者重在史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后者则立足于史料的基础上展开哲学和文化学分析。呈现给读者的结果因此有所不同：前者是对已见文字史的发掘、修复和校订，后者是对未见文化史的再现和探寻。

笔者是在写作“在的哲学”过程中，无意间发现“文字考古”的，在思考“天人合一”命题的最初涵义时，想到要去查阅古汉字“天”和“人”的初义。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华夏先民在逐渐呈现出“天”和“人”这两个古汉字时，“天人合一”思想或许就已经蕴含于其中了！这促使我萌生了通过远古汉字初义寻求中华哲学渊源的念头。好在笔者中文出身，对古汉字的情感尤在，也一直记得二十多年前老师说起古“虽”字的情形：一种发出“虽”音的虫子，每鸣叫一声便后退一步，华夏先民便依照其且鸣叫且后退的形态，刻画出一个古“虽”字来，读如“虽”音，古“虽”字便成了虫子虽的“其名自呼”，如同虫子虽在古汉字中说出自己一样。古“虽”字还兼有“退一步说”的意思，并因此有了“虽然”一词。词语“虽然”有“退一步说（即便你说的都成立），也不能支持你所要的结论”义。虫子虽就这样后退着爬进了华夏先民的语言

中，一直鸣叫至今。

非常幸运的是，笔者网搜“文字考古”时，意外发现周清泉先生三卷本《文字考古》大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14年出版。作者称“文字考古，以古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如该书的副书名所示——“对中国古代神话巫术文化与原始意识的解读”。周著给笔者很大信心，并因此确立了本书的第一个维度即“文字考古”的维度。和周著有着显著不同的是，本书立足于哲学视角，挑选出古汉字研究的部分成果带进哲学和文化学车间，再加工成本书所需要的新产品：华夏先民原初的哲学样式和文化样式。由此引出了本书的第二个维度即哲学维度。

正因为如此，本书特别重视古汉字的初义及其获得初义的路径。这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如何理解“初义”二字。今人所能接触到的最早的成型汉字只能是商周时的甲骨文和金文，但它们显然不是华夏先民最初使用的文字。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纹饰符号（以仰韶、龙山等地的陶文为代表），更像是先民们所刻画的原初文，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且研究手段只能是合理推测。所幸的是古文字学者们一直都在追寻初义，也称之为本义，并留下大量训诂学资料。笔者远非古文字业者，所能做的只是部分引用前人的古文字研究成果，从有关“初义”和“本义”的多种解释中，尽可能寻找出自认为相对可靠的解决方案。笔者进行寻找或判断的依据，更多地与哲学有关，也即多基于哲学的视角。

千万不要被哲学字眼所吓倒。只要您高中毕业，又对本书话题感兴趣，自然就能看懂。也无须记住书中生僻的古汉字，那是给学者们留的。凡是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在校学生、汉语教学和汉语爱好者、汉语写作者、对中华文化和哲学感兴趣的外国朋友以及那些试图帮助孩子获得良

好语言能力、建立母语文化认同的年轻的父母们，只要愿意一读，都能比较轻松地进入本书话题。

本书无意讨论哲学话题，仅仅是将某些哲学分析方法作为特殊的考古工具引入本书，进而从古汉字中发掘出曾经流淌在华夏先民生活中的文化、哲学乃至生活乐趣。举汉字“人”为例，本书并不打算涉及高深莫测的人学理论，也不打算像《文字考古》那样在史料中描述华夏先民的原始意识，只是将刻画在甲骨文中的那个“人”字，还原为一个“劳作之人”，再同西方文化中的“面具之人”（英文“人” person 的拉丁文前身有“面具”和“位格”义，演好上帝分派给自己的角色，守住自己在 Logos 中的“位格”，就是每个人的人生。上帝就是那位在剧场之上俯瞰人世一切的唯一神。英文 god 有剧场屋顶观众义）进行比较，从中演绎出中华哲学和中华文化的原初样式。由此演绎的成果既是演绎对象的一孔之见，也有笔者的一己之见。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所使用的哲学工具被称之为“在的哲学”，先是借用后期海德格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启示，再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最后融会贯通而成。相对应的西方哲学（准确地说是后期海德格尔所批评的西方形而上学）被称之为“思的哲学”。详细介绍这样的一件工具不是本书的任务，简略且通俗地描述一下中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希望能对阅读本书的兴趣做加法而不是减法。

把生活世界比喻为一条无形也无尽的河流，直接在河流中游泳的哲学话题构成“在的哲学”；坐在河岸上对河流、泳者及游泳过程进行观察的哲学，构成“思的哲学”。所谓“在”，意即我一直在生活河流之中（此即“天人合一”命题的最初涵义），我既是生活河流中的游泳者也是生活河流的生成者，其哲学形式多是对生活（即游泳）的直接体悟。所谓“思”，意即所思者成为反思之我的对象物，通俗的说法叫“物我两

分”。思的哲学就是对世界和我进行观察、反思及论证的哲学，所关注的是我和世界所呈现出来的现象。生活本身的意义当在游泳过程中，而非对生活河流和泳者的观察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夏先民在生活世界里游泳的哲学或许是指向未来的。这也是后期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所在。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推开古汉字的一扇扇石门，进而呈现出华夏先民在生活河流的不同区域中游泳的不同姿势。哲学只是以工具的形式进入本书，所呈现出来的也只是哲学工具使用后的效果。读者自然也就无需理会哲学工具自身的样子。带上各自的思考力，进入本书所谈论的话题，推开一扇扇古汉字的石门，领略中华文化和中华哲学的原初样式，才是读者和笔者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

无论对笔者还是读者而言，进入本书话题都是一次激动人心且生动有趣的经历。它不仅是一次文化（哲学）探险和寻宝行为，还是一次在历史深处对话我们自己的行为。华夏先民的文化样式注定和今天的我们一脉相承，先民们曾经游泳过的生活河流一直流淌到了今天。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汉字，像化石一样点滴汇聚了华夏民族生活河流的源头。最初是一派清澈，简洁、天真，充满活力，远没有后世的陈腐和污染。在今天的我们看来，那就是神的河流，那就是天堂之水。游泳于其中的华夏先民们的思想之光足以穿透历史、射向未来。需要我们做的，仅仅是去推开上古汉字的一扇扇石门。

周灭殷商后，出于对前代殷商族文化记忆进行遮蔽的需要，相当一批汉字开始遭受不公正待遇，其初义或被清洗或被篡改或被污名。其典型标志就是荀子所言的“刑名从商”，原本属于商人用于氏族认同的原始巫术如黥额等，被周人用作处罚罪犯的刑名。华夏民族史上的第一次文化改造运动发生于此，周代以后更是愈演愈烈，至秦始皇时代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了解这一历史真相，并非是为了要追责古人，而是为

了帮助今天的我们更健康地走向未来。

笔者无意将本书写成一本形式上严守学术规范的著作，更不愿意那些晦涩的术语和多得令人生厌的索引吓跑潜在读者。文字训诂原本偏冷，又需要足够充分的引证，如按照学术著作规范，资料索引加上术语解释的篇幅可能会将本书的厚度放大一倍。本书尽可能将它们省去。若遇到不太熟悉的训诂学术语，建议去网上搜索，既可节省本书印张以利环保，又可避免令那些早已熟悉这些术语的读者生烦。为保证一定的学术性，本书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资料引用，希望偏爱通俗性的读者不至于厌烦它们。繁忙时可先跳过它们，空闲时再静心品读甚或追问其中的逻辑关联，会有新的感悟。生僻汉字还是不用记它，那不是本书的目的。

每个人都是上古语言的受益者，探索古汉字里所隐藏的关于中华文化和中华哲学的秘密，会让我们再次受益。正是基于这一理由，笔者认为在学术性与可读性两端之间，舍弃任何一端都是难以接受的。限于笔者的学识和文字能力，又无法将两者融合得水乳交融。这是笔者需要向读者事先说明并致歉意的地方。

本书所选用的古汉字字源和训诂资料，构成了本书的第三个维度，即传统的训诂学维度——作为本书的基础部分。其中的大多数来源于上海新世纪出版集团之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古文字诂林》一书（共 12 册）。该书属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邀请了一大批拥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古文字学专家担纲学术顾问，并组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纂委员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采用八种古文字字体。这也是笔者钟情于该书的主因之一。另有少量字源和资料选自《汉语源流字典》（谷衍奎编，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本书正文落在谷衍奎名下的见解均源于该字典）。谨向编纂者和出版者表示感谢和敬意！恕笔者引用时就不再一一标注来源索引了。至于其他来源的资料，本书一般会简要

点明出处。

如何对训诂资料进行取舍判断，对本书的写作来说是个重大问题。笔者渐渐悟出了一个方法，可类同于“最大公约数”法。其基本态度是，首先要对前人之说怀有敬意和“学术善意”，相信他们全都出于学术目的，所言皆有所本。然后努力从中寻找出一个尽可能满足各家之说的方案来。如将每一个汉字的流变历史比喻为一条小河，不同的学者看到的可能是这条小河在不同处的景观，尽管都以为自己是在追寻初义。本书打算通过“说”出古汉字背后有关先民生活、文化和哲学故事，来表明自己“看”到的更像是汉字河流的源头。这一做法首先可保证所得观点有较广泛的解释力，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多地顾及各家之言。

以笔者浅见，“文字考古”话题中的观点解释力，或许还应加入如下考量：1. 在相应的观点之下，汉字的构件是否符合经济和美学原则，一个字中的每个构件是否都得到了合理解释，既无遗漏，也无重复；2. 字的初义与引申义之间的连接是否自然，越自然或许意味着观点越具备合理性，反之则存疑。对各家之说的兼容、文字背后的生活故事（及其哲学理解）等，也当成为重要的考量因子，前文已叙。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不同汉字在历史中的境况是大不相同的，甚至迥异的，如“辛”“妾”这些汉字就遭受过污染、遮蔽和歪曲等不公正待遇。说出这些故事，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所能做的，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另一份幸运是，写作过程中恰遇朱大可先生新著《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出版。朱著以“音素学考古”的方式切入，创新性地再现出世界（及华夏）民族、语言和神话同属“非洲起源”这样一个理论视角，并进而概述出华夏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神话的基本脉络。其“因素学考古”更是直接将本书“文字考古”带向全球视野，

这是笔者特别要感谢的地方。笔者此前零星接触过“非洲起源”说，学界很早就流传有周民族来自西方一说，孟子也曾说过周文王为“西夷之人”（《孟子·离娄下》）。但能将古汉字话题与“非洲起源”说结合到一起，则是受《华夏上古神系》特别是“因素学考古”的启发无疑。

虽然“非洲起源”说的历史细节尚有待挖掘和完善，但其表达的思想——笔者将其表述为“将人类生活世界接续为一个整体”的努力——则是笔者高度认同的。该思想不仅在互联网世界中正趋向现实，同时成为国际组织、国际公约乃至国际学术交流的共识。反过来说，如没有这样一个共识在，所有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乃至国际学术交流都是值得怀疑的。“非洲起源”说成为本书的第四个维度，进而启发了笔者对中西哲学差异原因的新思考——基于“非洲大迁徙”背景的思考，并逐渐将“中华哲学为何以及如何远离帝神传统的？”这类问题带进写作中。值得庆幸的是，本书寻找到了华夏先民（准确地说是王权）疏远帝神和宗教的大量古文字痕迹，进而发现了充满神性力量的古文字地质层。本书后记《唤醒文化地质层中的神性力量》汇集了部分思考成果。要想更好地理解先民们的文化样式，需要我们将自己前置到他们的时代中，而非只是用“科学”的眼光审视他们。本书也保留了一些内含有与《华夏上古神系》存在某种不一致的描述，笔者更多地将其理解为源于维度（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料）差异，以方便读者多维度地思考。

至此，本书已展现出自身的四个维度：基于后期海德格尔和中华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即“在的哲学”，朱大可先生的“非洲起源”说，周清泉先生的“文字考古”，加上传统的“文字训诂”（以《古文字诂林》为主）。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上述四个维度之间的观察方案及其景观。笔者对该方案可能有的错误负责。笔者渴望的第五个维度——中西文字比较，只能寄希望于贤者了。本书只是在一两个地方涉及了这一维度。